

关于陕西发现波斯萨珊金、银币的研究

姜宝莲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研究员
郭明卿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馆员
梁晓青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副研究员

对于波斯萨珊币的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许多钱币学专家从钱币的形制、材质、单位、重量、纹饰、文字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整理和研究。近些年来，在西安及其周围发现了多种波斯萨珊币，由于丝绸之路的纽带联结，这些制作于公元4 - 8世纪的波斯萨珊金、银币在隋唐的都城长安及其周围出土和发现，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这些萨珊币是否具有流通货币的功能，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以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重要差异作一概述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波斯萨珊金、银币概述

波斯铸币是从吕底亚传来的，吕底亚为一繁荣昌盛的国家，在克洛伊索斯（前570 - 546）在位，铸造各种图案的金银币作为通货，统一以币上面值为准。大流士曾铸造

称为“大流克”的金银币，其上有他的肖像。过去大多数国家都以重量为准，需在每一次交易中称量，以政府统一铸造的钱币代替这种原始的金属货币是个巨大的进步。萨珊时期的金币较为少见，较多的是银币和铜币，而在中国发现的多为银币。

目前所发现的萨珊银币采用了基本固定的面额和重量标准，正面为国王的肖像，为右侧面，与安息货币的做法正相反，国王的正面像较少。国王的名字和称号刻于靠近边缘的地方，而且，每一统治者都有自己富有个性化的王冠^[1]。钱币的反面均为有圣火的祭坛，火坛两侧各有一祭司，这样的设计，所表现的主要含义就是君权神授。萨珊的“众王之王”（shahanshah）是王家的幸运承担者，它体现了王朝和整个国家的幸福和命运。萨珊的君主被认为是琐罗亚斯德教及其最高创造神阿胡拉·马兹达在人间的

代表和对应者。因在波斯王的之下还有许多臣属国的王，所以波斯统治者自称为“王中之王”，这种称谓说明了波斯君主制的军事起源和专制本质。（见表格）

1、在陕西出土的萨珊银币中，出土最多的有2批，一是陕西长安县天子峪隋唐时期的至相寺舍利塔中，出土7枚波斯萨珊式银币，其中有6枚属于库思老二世时期的银币（图1），一枚属于布伦女王银币（图2）。二是陕西长安县的另一古寺遗址发现的亦为7枚萨珊银币，而且文中称，在7枚萨珊银币中发现有一枚为沙普尔二世的银币，其余6枚情况不明。沙普尔二世银币是在陕西发现波斯萨珊银币中年代最早的银币。

这些钱币采用固定的面额和一定的重量标准，正面为当世统治者的肖像，反面是圣火的祭坛。国王肖像的脸大多向右侧，国王的名字和称号刻在靠近边缘的地方，而且每一统治者都有自己极具特色的王

陕西出土波斯萨珊银币统计表（据各种刊物发表资料）^[2]

	出土地点	出土时间	银币王属	在位时间	数量	尺寸 (cm)	重量 (克)	保存状况及材质	出土状况
1	陕西长安县古寺遗址		沙普尔二世 (Shapur II)	公元309 - 379	1			银	与其他6枚萨珊银币同装一罐内 ^[3]
2	西安东郊出土	1995年	沙普尔二世 (Shapur II)		3	2.25	4	银	出土一罐内共5枚，只征集3枚 ^[4]
						2.14	3		
						2.15	2.2		
3	陕西耀县	1969年	卡瓦德一世 (Kavad I)	公元488 - 531	1	2.9	4.2	银	塔基、与金银物件装入一铜盒内
			库思老一世 (Chosroes I)	公元531 - 579	1	3.2	4		
			卑路斯 (Peroz)	公元459 - 484	1	2.75	3.8		
4	陕西紫阳县 ^[5]		卑路斯 (Peroz)	公元459 - 484	1	2.7		银	征集
5	西安李静训墓		卑路斯 (Peroz)	公元459 - 484	1			银、边有一小孔	墓葬
6	西安张家坡隋墓		卑路斯 (Peroz)	公元459 - 484	1			银	墓葬
7	西安	1953年	库思老二世 (Chosroes II)	公元590 - 628	1	径21	44	银	墓葬
8	西安何家村	1970年	库思老二世 (Chosroes II)	公元590 - 628	1			银	窖藏。同出的有金银器等 ^[6]
9	陕西长安县天子峪	1965年	库思老二世 (Chosroes II)	公元590 - 628	6	3.3	4.1	银	出土于塔基，装一银盒内
						3.3	4	银	
						3.3	4	银	
						3.3	4.1	银	
						3.2	3.6	银、边残	
						3.2	2.7	银、残缺小半	
			布伦女王 (Boran或Buron)	公元630 - 631	1	3.2	4.1	银	
10	西安郊区墓007M3		库思老二世 (Chosroes II)	公元590 - 628	1			银	墓葬
11	西安 ^[7]	2004年	库思老二世 (Chosroes II)	公元590 - 628	1	27-29	72	金(含金97.97%)	不详

冠，这些王冠的设计显示了萨珊艺术的精髓。

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沙



图1 长安县天子峪佛塔出土库思老二世银币



图2 长安县天子峪佛塔出土布伦女王银币

沙普尔二世在位为公元309 - 379年，也就是西晋永嘉四年到东晋太元四年，在这一时期，也正是苻坚统一北方建立前秦政权的时期，前秦开始于公元351年，定都长安，并且在其统治时期，极为重视对西域的经营，不仅用战争的手段，征服龟兹、焉耆，而且也遣使携带丝绢前往西域各地，进行友好的交往。《晋书》“光（吕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语在《西夷传》。光于是大脩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光从之，以驼二万

普尔二世的银币也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萨珊朝银币，发现最多的是在新疆的高昌古城，陕西仅发现有二枚，很可能是在这一时期的交往过程中输入的。但由于所发表文章资料，关于该地的详细出土地点、同出器物的资料、同出钱币的详细信息以及属于沙普尔二世银币的照片和拓片没有交代清楚，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需今后进一步深入。

2、1965年陕西长安县天子峪唐代塔基下出土6枚库思老二世（Chosroes）银币和布伦女王银

币。

库思老二世（公元590 - 628年）在位38年，在位期间，波斯帝国经济繁荣，贸易发达，在此期间，所铸货币数量也大增。就目前陕西来讲，出土最多的就是库思老二世的银币，这和全国范围内出土情况的统计基本吻合^[8]。出土的完整银币直径均为3.3厘米，重4-4.1克。由于银币为圆形，正面纹饰布局与币形和谐，在二周联珠纹内是库思老二世的右侧面像，联珠纹外侧分四等份分别饰有新月托一星状物，星状物显示为六角形。库思老二世头上戴有王冠，冠顶有翼翅分张，上侧托星新月图案正在分张翼翅中间。背面亦为圆形设计，三周联珠纹中为一圣火祭坛，祭坛分为三层，顶部有火焰，两侧祭司柱仗而立。联珠纹外侧亦有分四等份饰有新月托一星状物图案。库思老二世银币是萨珊晚期的典型式样，以后诸王均仿制，甚至影响到阿拉伯帝国占领萨珊王朝之后，即“库思老二世式样”。库思老二世银币在中国发现最多，作为隋唐时期都城的长安及其周围地区，出土的此类银币也为最多。另外，在币面有铭文，这些铭文以巴列维文书写，为“HARMAN AFZUT HUSRUT”，据有关专家的翻译，意为“命运昌盛的库思老”。另外在币面上还有铸造年份和铸造地点的铭文^[9]，铸造年份分别为614-628年，铸造地点的城市以缩写形式出现，代表了那些被授予拥有铸币厂的城市的全名，在发现的这些库思老二世银币中，其铸币地点也各不相同，可见

其铸造规模之大。

另外还有一枚为布伦女王银币，布伦女王在位（公元630 - 631年）仅有二年，因此就全部发现来看数量也较少。在萨珊王朝的银币中，仅有的一位王后的肖像，

就是这位布伦女王。陕西出土的这枚银币，其直径3.1厘米，重4.1克，币面的纹饰布局与库思老二世银币基本相同。正面为二周联珠纹内有女王侧身像，冠顶有翼翅分张，中有一新月托一圆球。王冠上有两

条联珠串垂下，并侧贴有六枚贝形花饰，而钱币的背面与库思老二世银币完全一致，从铭文上还看出，这枚银币其铸造时间为公元630年。

3、1969年4月在陕西耀县寺坪村舍利塔基下出土卡卑路斯银币、库思老一世（Chosroes）银币（图3）和卡瓦德一世银币。陕西紫阳县出土一枚卑路斯银币（图4），但所发表资料仅为钱币拓片，其钱币纹饰细节不甚清楚，但从现存拓片来看，是否是卑路斯银币还需作进一步的考证。

卑路斯（Peroz），在位时间为公元459-484年，卡瓦德一世在位时间为公元488 - 531年。

库思老一世在位（公元531-579）是萨珊帝国的一个兴盛时期。Chosroes是希腊人对他的称呼。库思老一世在位48年之久，目前所知，其铸币地点也有八十多处，所造钱币的数量也很多，这一银币铸于公元543年。

4、西安发现的萨珊库思老二世金币（图5），其形制和纹饰与同期的银币基本相同，正面纹饰为库思老二世的右侧面像，头戴王冠，冠顶有翼翅分张，上侧托星新月图案。背面有三周联珠纹，与币形和谐，正中为一圣火祭坛，祭坛分为三层，顶部有火焰，两侧祭司柱仗而立。和银币相同，币面上有纪年铭文，并有对当政国王吉祥赞语。

二、分析研究

以上资料仅仅限于散见于各种报刊发表的，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数



图3 耀县出土库思老一世银币（照片）



图4 紫阳县出土卑路斯银币（拓片）



图5 西安发现的库思老二世金币

字，但从了解的现存实际发现数量来看，要比上面统计的这些数字为多，但是多散在钱币收藏者手中，大多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从发现的分布区域来看，基本上都集中于隋唐首都长安的附近。现仅利用这些发表的资料对在陕西发现的波斯萨珊金、银币做一综合分析。

1、陕西发现金、银币是否具有流通货币的功能

关于这些金银币的功用一直是研究这些货币的焦点问题之一，有人认为萨珊银币曾具有通货作用，尤其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曾经使用过银质货币，《隋书·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而且，从反映这一时期的文书中，也可看到使用银钱买舍、赁舍、雇人、买马、买奴等等，在商业活动中，被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因而具有货币的功能。但另一种观点认为，西亚的钱币没有在丝路沿途作为通货流行，而较为流行的是中国钱币五铢钱以及受汉文化影响的于阗汉文钱和汉文、佉卢文二体钱^[10]。

西北地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横穿这一地区，而且，这一时期的这一地区不仅有许多小的王国，而且也有许多外国商人杂居于此地，当地政权的货币并没有受到中央货币政策的统一控制，因而，在一定的时期内，中国传统的方孔圆钱以及小王国的自行铸币包括外国金、银币都可能在一定的时期或一特定的区域内承担货币的职能，但是这不足以证明萨珊王朝从中国进口物品主要是靠

大量银币支付的。

长安作为汉唐时期的都城，就货币的使用来讲，具有较为严格的管理手段，在陕西发现的这些金银币，包括在长安城中一些遗址中发现的货币都不能看作是当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在流通。因为，一般来讲，货币作为法定的通货只能在一定的领域内流通，作为隋唐都城的西安及其周围地区，已有完整的货币流通体系，在社会活动中铜质货币是法定的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起作用货币，而金银都以金铤、银铤的形式出现，因而这些萨珊银币没有作为货币流通。从发现的地点来看，这些金银币基本都出土于墓葬与寺庙的塔基中，少数出土于窖藏，这些都显示了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作为一种财富的象征，显示的是金、银这种贵金属价值。

2、与宗教信仰相联系

金、银币的纹饰充满着宗教的气息，在他们看来，金银币代表了自己的财富，而财富的取得，仰仗着神的赐予。所以不管时间如何流逝，国王头像如何变换，而每枚钱币都有一固定的纹饰，那就是火祆教的祭坛。

金银币出土最多的是在墓葬和寺塔中，这种现象都与宗教信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以波斯萨珊为主的中亚地区，有一信仰火祆教的区域。祆教也叫琐罗亚斯德教，其最高神为阿胡拉·马兹达，是光明之神，也是天堂之主，这一宗教最早起源于大流士一世时期，被宣布为当时的国教。琐罗亚斯德教反对建神庙和神像，不过神坛是有的，通

常建在山顶上、宫殿中、或城市中心。每座神坛上必点燃起敬奉给阿胡拉·马兹达或某一小神的圣火。火本身也是神，名叫阿塔爾，是光明之神的儿子。每个家庭以火炉为中心，保持圣火不灭是虔诚敬神的表现，太阳是天空中不灭的火，是阿胡拉·马兹达的化身。

这一宗教在萨珊王朝时得到复兴。波斯人崇拜太阳甚为热烈，祆教没有神像，但他有祭司、庙宇和祭坛，在坛前举行祭祀的仪式。从阿尔达希尔开始（227年），这个宗教就是波斯的国教。国王严格地按古代方式被认为是神圣或半神圣的，萨珊钱币的纹饰来自于王朝的政治和宗教因素，萨珊国家的首脑是国王，萨珊国王自称“马兹达（Maz-da）- 受人崇拜的至尊”，显示出众王之王是最高神的尘世化身^[11]，表达了这种君权神授的神圣。

祆教为波斯的国教，之后随着波斯帝国领土的扩张，祆教的流传范围也得到了扩大，由于粟特人处于丝绸之路的要道上，这一时期的这一地区，祆教也极为流行。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扩大，在都城长安聚集有许多西域人。据向达先生研究，唐代留寓长安的大致有四类人，一是魏周以来入居中夏，华化虽久，其族姓犹皎然可寻，二是胡商逐利而来，三是异教僧侣传教而来，四是外族遣子为人质来到长安。在这各类人中，就西域各族来看，有于阗、龟兹、疏勒各国，另外还有中亚、西亚的昭武九姓及波斯诸国，性质较为复杂。由于这些

人的聚居，其所信仰的祆教在长安极为流行，据陈垣先生的研究，祆教进入中国^[12]的时间大约在北魏神龟年间，即公元518 - 519年，之后北魏、北齐、北周都较为流行，唐代对于火祆教崇祀又加，置有祆官。宋敏求在《长安志》中载：“（布政坊祆祠）此内有萨宝符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职”。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的隋代虞弘墓^[13]，其石椁上雕刻的有波斯风格的画像内容，其中有一祆教的圣火坛，火坛两侧各有一人首鸟身像。墓志中记载墓主在北周曾任“检校萨宝府”一职，萨宝是祆教的宗教首领，后被作为管理来华外国人的官员称呼，其墓主本身也应

是一祆教徒，这是无疑的。

因此，在漫漫的商旅途中，由于丝绸之路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要翻越高高的雪山，穿过茫茫戈壁，其艰险是不言而喻的，宗教作为一种精神的寄托，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据研究，“萨宝”一词，来源于粟特语S'rtp'w^[14]的译音，其意为商队首领。既是商队首领又是祆教教长，用宗教的组织形式来统领商队。因而货币作为崇拜物带到中国，因而货币又有了宗教信仰的象征。在墓葬中随葬萨珊银币的墓主，其中应该有祆教教徒。同样作为随葬品在墓葬中发现的其他金银币应该也具有这样的功能。这些有着宗教信仰的西域商人沿着丝绸之

路将他们的崇拜物带到了所到之处。

3、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金、银币的来源

中亚是一个文明的交会之所，这种融合后的文明随着丝绸之路传入，而宗教的传播带动了其他文化因素的交流，他们不是孤立的传播，而是伴随着一种宗教和文化的结构而传播。这些文化因素相互交织，产生了冲突和互相的渗透，社会结构也以同样的方式互动，包括政治与经济生活。

《隋书·西域传》中曾提到隋炀帝时期（605-618年）曾遣使与波斯来往，记载中提到当时波斯的国王名叫“库萨和”，这一“库萨和”就是库思老二世。两唐书中又记载有库萨和的女儿曾有较短时间为王，这可能就是布伦女王。同时还记载有波斯最后一个国王“伊嗣候”也就是伊斯提德泽三世，曾遣使到达长安，后伊嗣候为大酋所逐，投奔吐火罗，但在中途被大食所杀。其子卑路斯无处所归，唐代咸亨年间又返回中国，唐长安城中礼泉坊的波斯胡寺，就是在这一时期所立，其子泥涅斯图志恢复，但最终未能成功，之后客死长安。在这一时期波斯与唐朝有着较为密切的政治上的关系。

在4 - 8世纪的长安，随着这些粟特商人的到来，各种宗教也开始流行，在西安发现有苏谅妻墓志，该墓志志文使用婆罗钵文（也称巴列维文）和汉文写成，这是一祆教徒无疑。据两唐书记载长安布政坊有祆祠，醴泉坊有安令节宅，波斯



图6

胡寺、袄祠，普宁坊有袄祠，义宁坊有大秦寺，崇化坊有米萨宝宅及袄教，多在长安城西部^[15]。昭武九姓中的康国人素以善贾市著称于西域地区，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在昭武九姓中，安、曹、史、米诸国均信奉火袄教。另外西安（长安）出土有米萨宝墓志，墓主卒于长安县崇化里，其“萨宝”并不是其人的名字，应是火袄教的神职教长之称，此人或系为流寓长安的火袄教教长之一。

4、金币的发现与制作工艺

从世界范围来看，萨珊金币极为少见，发现较多的是萨珊银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波斯萨珊银币已有600多枚。由于金币发现的数量很少，萨珊金币不是作为流通货币制作的，可能是用于炫耀或赏赐。这次在西安发现的波斯萨珊金币，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丝绸之路及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物资料。

这枚金币从形制来看，与银币制作手法基本相同，应该是使用模具用手工打制而成，但由于在制作中没有严格的和模要求，所以出现了钱币的形状和纹饰正反面不能完全对应的现象。

东西方钱币文化有一重要的差异就是，前者采用铸制币，而后者长期采用打制币，也叫冲制币、锤制币。其方法是将金属熔铸成板条，冲成毛坯，然后置于上下模之间，用木锤锤击成型，进行修剪、称量工序，制成符合标准的钱币（图6）。

5、存在的问题

陕西出土的外国金银币研究状况来讲，对于钱币本身的描述非常详细，但对于出土钱币状况的相关资料却不甚明确，比如钱币放置的位置，同出器物的组合，如是在塔基里出土，那么它所摆放的位置和同存放的器物，应该有一定的意义。另外还有钱币保存状况，钱币的监测分析以及墓葬墓主的种属鉴定等等，都缺乏相关的资料，使得相关的考古信息没有被反映出来，因此，这些方面是今后进一步研究此类钱币应该注意的问题。

注释：

- [1] 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考古学报》2004年1期。
- [2] 据统计在陕西共出土11批萨珊金、银币，数量为23枚，据了解，在一些钱币收藏者的手中还有一批数量不少的银币，陕西出土的萨珊银币远不止这些，但由于出土地点、出土状况不清，因此，就本文来讲，仅以公开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资料为准进行研究。
- [3] 郝朝之：《长安县古寺遗址发现萨珊银币》，《中国钱币》1991年2期。
- [4] 党顺民、赵小明：《西安出土沙普尔二世银币探讨》，《陕西钱币研究文集》。2000年12月。
- [5] 施昌成：《紫阳县发现一枚波斯银币》，《中国钱币》1991年1期。
- [6] 子亮、马骥：《西安发现波斯萨珊王朝金币》，《陕西钱币研究文集》。2000年12月。
- [9] 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72年2期。
- [10] 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

社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

-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12] 陈垣：《火袄教入中国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
- [13] 张庆捷：《中亚古国图像资料的重大发现》，《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
- [14] 林梅村：《固原粟特墓所出中古波斯文印章及其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7年1期。
- [15] 向达：《唐代长安及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87年。